

「中國近代史研究的過去與未來」

座談會發言紀錄

爲紀念近代史研究所成立三十週年，本所於本年二月二十六日上午舉行「郭廷以圖書館」命名典禮，以紀念郭前所長對本所之貢獻。接着舉行座談會，以「中國近代史研究的過去與未來」爲主題。會中由沈雲龍、李國祁、王聿均、王樹槐四位先生擔任引言人，對本所的過去提出檢討，對未來的研究方向提出建議。自由討論時，楊紹震、陸寶千、呂士朋、劉鳳翰諸先生亦分別發表意見。現將四位引言人的發言紀錄，刊載於下，以誌盛況。

一、沈雲龍先生

今天本人應邀參加近史所創立三十週年紀念及郭廷以圖書館揭幕典禮，並要在座談會首先致詞，至感無比的榮譽。今天是舊曆正月初七日，俗稱「人日」，藉此向各位老朋友拜個晚年。

首先我要談起和近史所發生關係，真是偶然中的偶然遇合。大概是在民國四十七年夏秋之交，那時成立不久尚在籌備期間的近史所所長郭量宇先生，我和他並無一面之識，忽託胡秋原傳言給我，希望約我一談，秋原兄並且建議我不必拘泥形式，何妨先去拜訪，我認爲也沒有什麼不妥，於是和秋原兄洽好時間，到和平東路師大宿舍去訪晤郭所長，初次晤面的印象，我覺得他面容嚴肅，深沈而又拘謹，似乎有點莫測高深！但話匣子打開，卻又熱情洋溢，好像多年老友似的。並且談到他肄業東南大學附中時期的業師四川合江穆清波先生，我說：「穆先生是我南通中學的校長。」他說：「那我們是先後同門了！」他又提到：「在南高師和東大同學中幾個著名國家主義派的朋友，想必您都認識？」我很詫異他對我的底細，何以如此清楚，自然我的對答，也就不必隱瞞了！

最後他提出意欲邀我至近史所佐助，徵我同意。我即率直的說明，雖已辭去經

濟部公職，但仍任國大代表，每月支領公費及實物配給，不便再擔任公家機關專任職務，且距南港過遠，無法每日按時上班，只好謝謝他的好意。但他仍表示在兼任研究員與副研究員之間，對我作一考慮，既然如此盛意殷殷，我也就唯唯以應，興辭而出，在愉快氣氛中結束了初度晤談。

自此次晤談後，久久無消息，直至次年十月四日，郭先生再度過訪，我適外出，乃先電話秋原兄詢問究竟，承告個中情況，並復我一長信，說郭先生欲請我擔任口述歷史工作，照兼任研究員待遇，月致鐘點費四〇〇元，另車資照支，另由臺大剛畢業的謝文孫君為助手。並謂此係「公私合營」之嘗試云云。我細思事隔一年而有此「公私合營」的結論，一定有不少曲折，除了學術南北門戶之見，還有黨籍異同之爭，不必深問，不便點破，凡事以難得糊塗為上策。老實說，我不是學歷史的科班出身，什麼名義，對我並不重要。既曰「公私合營」，倒是挺新鮮玩意兒，於我無損而有益，覺得不妨一試，遂於十月十一日答訪郭先生，表示願接受他的邀請，純粹私人幫忙，他見我如此爽朗，不讓他為難，頓時喜形於色，立表歡迎。這二度晤談，似乎彼此都有「助人為快樂之本」的感受。

不久，郭先生便於是月二十日來信，約我於二十七日上午到南港近史所會商口述歷史工作計畫，我如約前往，郭先生和張致遠、胡秋原兩位都在等候，並介紹謝文孫君與我相識。經交換意見後，決定由我草擬口述歷史訪問計畫及致被訪問者書面說明各一份，於是年十二月正式展開工作。第一位被訪問的是傅秉常先生，如是一直到六十一年九月止，歷時近十三年頭，我負責先後訪問了四十二位（根據我的日記），積成口述歷史紀錄稿件達數百萬言。我在六十四年九月所寫「敬悼郭量字先生」一文中（載傳記文學二十七卷五期），曾有較詳的敘述，與「近史所三十年史稿」有關口述歷史部分，紀載殊有出入，我的日記，應該是可信的。

像上述所謂「公私合營」的口述歷史工作，在一無合同，二無聘約，三無任何名義的情況之下，居然在近史所「行走」了十年以上，這不能不說是任何機關的創例，也可說是史學界一項奇蹟。我很感謝郭先生，承他不棄，為我出版拙著「黎元洪評傳」一書，雖未接受任何報酬，但卻引起有關方面斷章取義的嚴重關切，幸而郭先生挺身說明，才得化解無事。其次，我最感到高興的，就是和近史所發生關係後，結識了在座的都是史學界有卓越成就的老朋友，可說是平生最大的收穫。剛才韓總幹事報告近史所若干研究的成果，分別列出統計數字，這都是郭先生領導下諸位老朋友心血凝聚的結晶品，我謹以萬分誠摯的心情致祝賀和敬佩之忱！

最後，我就近史所的未來，略表一點個人的淺見。我覺得今後致力的方向，一是中國抗戰史，一是中共禍國史。應是老朋友們以史家的嚴謹的筆法來大書特書的兩大鉅著，不僅義不容辭，也是責無旁貸的。關於前者，一般都說「八年抗戰」，似已成固定名詞，其實是不通的，難道說從「九一八」瀋陽事變後，東北義勇軍及馬占山孤軍抗日，「一二八」淞滬之戰，和山海關、長城血戰，到蘆溝橋事變爆發前，這六年之間，將士的犧牲，國土的蹂躪，人民的傷亡，公私資產的損失，都可置諸不論嗎？所以談到抗戰，應該是首尾十四年，而非侷限於八年，這一「正名」工作，非常必要的。再說，有關抗戰史的書，出版不算少，個人閱覽也許有限，但我覺得私人記載雖零碎，但遠較官方文書的堆砌和諱飾，要真實得多，如像何成濬的日記，顧祝同、黃杰的回憶，裡面就有很好的抗戰史料，未被採錄。而且官方刊布的抗戰史，鋪陳一些圖表及統計數字，對戰爭勝敗得失，往往重其所輕，輕其所重，無法了解真象，這不合史家要求，也無法使後人知所警戒，如何補偏救失，我相信會引起近史所老朋友們的興趣的。

其次，關於後者，研究中共發展的歷史，王健民、鄭學稼、郭華倫三位先生都有鉅著出版，其他匪情專家也有不少零星作品，但多半置重點於中共內部理論路線權力的爭執和國共之間的分合，圍剿長征之類的敘述，我個人以為應站在國家民族的利益立場，將中共為禍國家半個世紀以上，尤其竊據大陸三十年迫害異己奴役人民罄竹難書的種種罪惡，作一忠實客觀而又詳盡的紀述，對其竄改歷史掩飾醜惡罪惡的詭辯，來一嚴正的駁斥，免得積非成是，欺騙當代，貽害後世，這也是近史所老朋友們秉筆直書刻不容緩的。

以上拙見，聊貢一得之愚，尚請在座的老朋友多多指教！謝謝！

二、李國祁先生

今日欣逢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三十週年的所慶，個人大約是當年助理員來近代史研究所工作的最早的一位。呂所長當年來近代史研究所，尚是個人奉郭所長量宇之命，前往相邀者。我與近代史研究所的關係真可謂有血有淚，亦有歡笑。近史所最初成立時，是借臺大圖書館後樓一個房間辦公，不久在座的呂士朋先生即前來參加工作，那時小呂兄是風流倜儻，常常請我們吃糖。此後近代史研究所遷往雲和街租一處民房辦公，開始做三朝籌辦夷務始末索引，楊紹震先生為我們辦「夷務」，專與饒大衛（David N. Rowe）打交道。再往後方遷來南港，在今日史語所

的樓上辦公。郭所長對我們要求很嚴，白天我們須編檔案，晚上則讀書，而且每月郭老板均要查考各人一月來所讀之書，由於我們是由最基層工作做起，因此基礎打得很結實。我們這一代當年學近代史談不到什麼好方法，完全是由學徒做起，唯正因為由學徒做起，才能對史料異常熟習。因此直到今日我仍感到那種笨拙原始的方法仍是有相當價值的。當年在近代史研究所無論是做索引編檔案或寫專刊我均全力以赴，因之亦成績不錯，我個人治學的基礎與學術的境界可說是完全是在近史所任助理員及助理研究員階段打定的，亦即深受郭量宇師的影響，郭先生對年輕人愛護備至，但亦管束甚嚴，任何稿件他均仔細批閱，每次 Seminar 報告如果不好則當場申斥，絕不稍假詞色，大致當年我們助字號人物都深受郭師嚴格要求影響，治學從不敢稍稍馬虎。今日在報章雜誌上常常看到有人認為治近代史者有所謂南港學派，如果真是有南港學派的話，則量宇師應該是開山鼻祖。當年郭師所擬定的工作方針，是由整理檔案史料入手，然後才寫論文和專刊，因此近史所的集刊及專刊均出的比較晚。在做研究方面，由小的專題研究，再慢慢地更上層樓，從事較大範圍研究，他的計畫最後是要研究中國近代化問題，故我們前幾年中國近代化的區域研究，可以說就是本他所原定的目標而進行的，實是他的遺志之實現，因此我在這本專刊的緒論中，特別提到如果有絲毫的成就與貢獻，實是他老人家之所賜。

郭師對青年人的要求，除了給予嚴格的訓練外，另一使大家獲益匪淺的，則是告知一嚴格高峻的學術境界，他常常要我們提高學術水準，對坊間寫作不够精當的著作，每予嚴格批評，我們如果閱讀這類書籍，他亦常予指責，耳濡目染，常此以往，每個人自然對學術的境界提高，兢兢業業，克勤克勉，從事研究工作不敢掉以輕心！

此外對於近史所的圖書設備及資料搜求，他極注重，親自圈選應購書單，現藏的外交檔案及經濟檔案均是他費盡口舌幾往交涉，方才蒙外交部及經濟部移交近史所收藏的，國內口述歷史工作他可說是開創者，在座同仁中不少在當年即曾參加過此方面工作。剪報與大事紀工作開所以來即予進行，從未間斷，三十年來即此方面所積蓄資料，已是極為寶貴的史料。至於國外合作計畫的爭執與拓展，他更是積極推行，不遺餘力。由最早的與西雅圖華盛頓大學的合作，到與哈佛大學建立良好關係，以及得福特基金會十年的支持，都使近代史研究所國際聲譽日隆，全所大多數同仁因此亦獲得出國進修機會，獲益良多。我個人始終覺得郭師對年青後輩是經師人師兼具的，近史所之所以能有今日的成就，就是依靠他的這種經師人師精神。

前面曾經提到外人常稱近史所的同仁為南港學派，如果我們仔細思考，所謂南港學派究竟有那些優點或缺點，就優點而言，應該是下列諸項：一、治學篤實，基礎穩固：這雖是治學的最根本要求，但必須承認如非由基層做起者，往往做不到，近史所早年同仁之所以有此之長，係得之於從事史料編纂工作。二、學術境界高超嚴肅：一個人學術境界的培育絕非一朝一夕之功，近史所同仁之所以有此成就，實是得之於長期的耳濡目染之效，自己的作品不一定就是一流的，但能有一個一流的境界與嚴肅的態度，自會有所改進，我們由近史所所出的專刊來看，確表現出此一情狀。三、講求方法，求變求新，不墨守傳統，頑固不敏：在治學的方法上，近史所同仁是確有卓越表現的，無論是統計學在史學上的大量應用，或社會科學理論的借用在國內，特別是自一九七〇年代以後，近史所作品是居於前茅地位的。四、開創研究經濟史、社會史及區域研究的風氣；近史所在學風上早期亦是如同一般治中國史者，極注重政治外交史之研究，但慢慢的因研究自強新政，而開始接觸到經濟史的領域，自中國近代化的區域研究計畫開始後，於是正式進入經濟史社會史與區域研究的範圍，並且因而帶動國內各大史學研究所的同學亦開始寫此方面的論文，而今更蔚然成風，變為一種史學界的時尚。使我國的史學研究確向前作快速的推動，將來任何人寫中國史學史，都會對此貢獻必定要加以紀述的！

在缺點方面，個人認為最嚴重的缺點是器局太小，每個人僅知深研自己喜好的一點，致而因寫了幾本專刊而沾沾自喜，不知史學的工作的最高成就，在於將一個時代作整體的觀察，寫一部數百萬言，或上千萬言的時代巨著，蕭一山先生尚留下五巨冊的清代通史，簡又文先生一生研究太平天國，最後亦完成六巨冊太平天國全史及典制考，不論兩位先生的著作水準如何，但這種雄偉的胸襟仍是令人欽佩及嚮往不已的！希望近史所同仁無論年長或年輕一代能以此互勉，使近史所的成就可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其次是所中研究工作的進行，過份自由而缺乏整體的規劃；每人完全按自己意思作學術研究，常常有些熱門問題，有很多人研究，而冷門則無人問津，於是造成近史所所出的專刊合起來不能將整個中國近代史拼成一個全圖，這是近史所的缺點，亦是我國當前史學界的缺點。最有效的研究工作，應是各人自有範圍，但合起來又能拼成一個整體。中國近代化的區域研究是朝這個方向努力，但在這方面所做的仍欠理想。

回顧三十年來近史所的成就固然令人感到有其貢獻，尤其是曾參與過所中重大工作而獲有豐碩成果的同仁，更會沾沾自喜，引以為榮。但就我個人的看法而言，

近史所的成就在道理上說，應該可以更好的，而之所以未能達到更好的境界，主要是因內部曾經有長期的人事糾紛，而此類人事糾紛就今日觀之，實是不必要而且幼稚可笑的，究其根本原因，實在是因南港天地太小，少數同仁由於長期蝸伏於斗室，不自量地養成狹隘褊急的心境，相激相盪，遂為近史所帶來相當不幸，個人不幸當年被捲入這一人事糾紛，所遭受的痛苦，今日每一思及仍然心悸激動不已，因此最後我願奉勸諸位年輕同仁，凡事和衷共濟，有和諧的工作環境，才能創造出理想的研究作品。而要有和諧的心境，則又必須擴大自己的胸襟，多與外界接觸，否則過去近史所的缺失，亦有可能再見之於將來，那將是近史所的不幸，亦是學術界的不幸。

以上，我因為以回老家的心情，來回憶過去這三十年，所以不自主的說出我內心的真情，有不當的地方，請多予原諒。最後，我敬以接續過去的基礎，再接再勵，開創更新的里程與時代，與各位老同事、新朋友相共勉。

三、王聿均先生

今天欣逢本所成立三十週年所慶，承呂所長、張副所長之命，得在此盛會中發言，感到無限的榮幸。剛才聆聽沈雲龍、李國祁兩位先生的高論，緬懷過去，瞻望未來，可謂語重心長，實在深有同感。我雖乏新義可陳，然歷年來也有些所見所聞，謹以在本所工作卅年的老兵的身份，提出一些淺見，敬請各位不吝指教。

今天近史所舉行座談會，來紀念建所三十週年，不僅是一個別開生面的慶祝方式，而且用「中國近代史研究的過去與未來」作為討論的主題，也是極有意義的。我國舊時詩人，對三十年的數字，頗為敏感，蓋從個人的生命着眼，三十年乃一驚心動魄的數字！像「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陶潛）」、「海鶴一為別，存亡三十秋」、「黃昏鼓角似邊州，三十年前上此樓」（劉禹錫）、「三十年前事，千秋萬世心」（戴季陶）等詩句，多為回顧過去而發的感慨。而我們卻要從策勵未來着眼，三十年的時光，在個人來說，正達而立之年，從學術發展來說，卻剛好奠定基礎，須待發揚創獲。從本所三十年的歷史來看，十年的籌備工作，「側重自草創期於完成」，是「從無入有」；正式設所之後的二十年，「側重於創獲期於精進」，是「從有求精」^①。本所現在無論設備方面，圖書資料方面，及研究成果方面，都

^① 四十四年四月十一日，朱家驊先生覆胡適先生函，謂籌備工作與正式設所，微有不同。前者側重自草創期於完成，後者側重於創獲期於精進。

可說達到「有」的階段，今後的發展，則全在「求其精」了。我們以建所三十年的今天，作為本所發展的重要里程碑，矚目未來，實在充滿了期待和希望，也自然充滿了樂觀和信心！

中國近代史的研究，在中國史學的各部門中，興起的時間較晚。五四時期，一般歷史學者的濃厚興趣，仍偏重在古代史方面。原因不外數點：一、學者們貴遠賤近和尊古輕今的心理因素；二、研究個人所生存的當下時代，猶如「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不免主觀武斷，難成客觀信史；三、近代史有許多人和事的忌諱（政治的或社會的），無法放手做去；四、近代的史料浩如煙海，運用起來十分困難，斷非個人的能力所能勝任；且有許多資料尚未公開，難成定論，往往徒勞無功。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近代史與近代生活息息相關，倘當下不加研究，等到時代湮遠，環境變遷，再去做的話，那就事倍而功半了。大家都熟知羅家倫、蔣廷黻兩先生是中國近代史研究的拓荒者，他們兩位前輩，不僅與本所首任所長郭廷以先生私交甚篤，而且也都與本所有極其密切的關係，指導和贊助，不遺餘力。兩氏且都曾為本所的通訊研究員。兩氏倡導中國近代史的經過，要追溯到半個多世紀之前。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一九二八）之間，可說是近代史研究的萌芽時期。羅氏倡導於東南大學，十五年秋，首開中國近代史的課程；蔣氏則於稍後任教於天津南開大學，搜求國內有關史料，並介紹歐美學者的新觀念和新方法。他們南北呼應，相得益彰。兩人有一共同的特點，就是都偏重於國際關係及外交史的範圍。民國二十年三月羅氏在武漢大學「社會科學季刊」第二卷第一號所發表的「研究中國近代史的意義和方法」一文，是近代史研究的重要文獻，為大家所熟知，勿庸贅述。他提出四點具體建議為：一、強調史料研究的重要，包括史料之尋訪、蒐集、整理、考訂和發表。二、要有科學的近代史，必先編訂「中國近代史料叢書」。三、提出專題研究（Monograph）的重要性。四、口述歷史（Oral History）的倡導^②。這四項，都是近史所三十年來所實踐的重要工作。因為郭所長與羅先生誼在師友之間，受羅氏之影響頗深。他在其大著「近代中國史」第一冊例言中曾說：「歷史研究，應自史料入手。以近代中國史論，現在尚為史料整理編訂時期，而非史書寫著時期。羅志希先生已詳論之」。又稱：「編者專力於近代中國歷史，則實受羅先生之教誨；本書之編輯，所得羅先生之指導協助尤多」^③。由此

^② 羅家倫先生著「研究中國近代史的意義和方法」，發表於民國二十年三月武漢大學社會科學季刊第二卷第一號。

^③ 郭廷以先生著「近代中國史」第一冊，「例言」第一條及第十二條。民國三十年初版，商務。

可看出他們共同的觀點。本所創設之初，一切的規劃和設計，多不出羅氏提出的範疇。整理和編輯史料，編纂引得（Index），及出版一序列的「史料彙編」，皆為本所早期的重要工作。四十八年起從事「口述歷史」和「專題研究」，兩年後，本所專刊即陸續問世。日積月累，漸著成效。雖然近年來中外學者對中國近代史研究的範圍，逐漸擴大，成績突飛猛進，研究的方法也改變了不少，但這一條舊的途徑，看似笨拙，實則踏實，仍不失為治近代史正確的途徑。

無可諱言的，中國近代史的研究，有其極為現實的意義。因我國自鴉片戰爭之後，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演變的劇烈，為有史以來所僅見。其影響於當前情勢及國際關係，至為深切。而與日、俄、英、美、德、法諸強和東南亞各國間的接觸頻繁，互為因果。所以治古代史學側重史實的考證，治近代史學則須面對現實，利重史實的因果，及其可能引起的影響趨勢。方法與要求均有不同，故在研究方面，似宜與古代史分別進行^④。朱家驊院長有鑒及此，對設立近史所一事，或早已有了初步的構想。民國三十八年以還，大陸淪失，政府播遷來臺。國人痛定思痛，冀探討過去失敗之因素，以謀補救，則加強近代史的研究，自有其必要。近史所適時成立，並非偶然。再看美國方面的「中國研究」，也突破了歐洲漢學研究的範圍和傳統，不再專注於語言學、考古學、藝術和中西交通，而注重到近代中國的政治和商業貿易各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美國即大力向太平洋發展，終於和日本發生了戰爭，構成世界大戰之一環。二次大戰結束後，更有中共的興起，控制中國大陸，引發韓戰，予美國以莫大的挑釁。因此，引起美國各著名大學對中國近代史研究的狂熱。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East Asian Institute）便是於一九四九年成立的，顯然與中國大陸的變局有關。在中華民國臺灣的中央研究院成立一個近代史研究所，也是美國學界所樂聞的。

本所設所，引起當時臺、港兩地最多的注意，亦有不少的批評。像香港出版的「自由人」，便有批評，中研院亦有書面的答覆^⑤。由於朱院長、總幹事周綸閣（鴻經）先生、史語所所長董彥堂（作賓）先生的極力贊成，近史所的設立，終告實現。實際上中研院擬進行近代史研究工作，發動甚早，因其攸關當前之政治經濟及國際關係之重要性，公私各方，均有督責。朱院長於抗戰期間在渝時，即曾與傅孟真先生談及，但因人才、資料、經費之缺乏，未克實現。本院遷臺之初，僅餘史語

^④ 朱家驊先生言論集「緣起」，近代史研究所民國六十六年五月初版。

^⑤ 四十四年四月二日，胡適先生致朱家驊、周鴻經、董彥堂三先生書。又見是年三月之「自由人」。

和數學兩所，賃租楊梅倉庫，僅蔽風雨，增所更談不到。直到南港建築，粗有眉目，朱院長始作具體考慮。因經費短絀，不得不瞻望外援。惟一般美援不涉及科學研究事業，但風聞美國國務院對於補助其他學術文化方面，另有法案。曾由本院擬備忘錄一件，託顧少川先生在華府設法進行，未獲結果。俟得亞洲協會在臺代表饒大衛 (David N. Rowe) 之贊助，於四十三年十二月十日，由朱院長在臺北聯合國同志會約晤饒氏，渠建議本院另特設一所(不附於史語所)，專治近代史，從四十四年一月起，由該會初步補助美金一萬至一萬五千元，當時未作決定。但增所係評議會之職權，當時評議會又無法集會，朱院長乃於四十三年十二月卅日，約集在臺院士及評議員聯席談話會(紀錄則仍沿用院士談話會，未註明評議會^⑥)，決定設立近代史研究所籌備處。此為本所成立的一段辛秘。旋由本院正式函覆亞洲協會，該會即決定四十四年補助本所美金一萬元，以七千元購英文書刊，以三千元購中、日文書刊。並由亞協代付書款，以免外匯折耗。翌年，又續補助美金五千元。同時教育部認為研究近代史，符合國策當前之需要，允從教部支配清華基金項下撥給補助美金五千元，作為購置圖書設備費用。本所早期圖書悉由此少數款項購買。現在我們在這座新建的圖書館大樓中，舉行建所三十週年紀念，撫今追昔，實在不勝其感慨。本所在艱辛中成長，對筆路藍縷奠定本所初基的諸師長前輩，尤致無限的崇敬懷念之忱。在本所成立之前，國人的近代史研究，多係學者個人單獨之從事；本所成立以後，則以機構集體之力，得從事有計畫之專業性的研究，較諸過去，方便甚多，成果亦較為顯著。

三十年來，本所同仁研究的重點和趨向，也有不少的轉變，最初為漸變(民國五十六年至六十五年)，繼之以急劇的改變(民國六十六年迄今)。張瑞德先生在本所三十年史稿第三章第二節「個人研究計畫」^⑦中，言之甚詳，且有頗為縝密的分析。茲就個人的看法，舉出其演變的特徵如下：一、研究範圍的擴大：由外交史、國際關係、政治史和制度史的研究，逐漸擴大範圍，遍及於文化、思想、教育、經濟、社會各方面的研究。二、研究時限的後移：研究重點從十九世紀後移至二十世紀，也就是從清季移至民國時期，由民初以迄抗戰，甚至漸及於戰後及中共問題。三、研究主題的創新：由事件、人物的研究轉變為綜合性的、創造性的研究，像「中國近代化的區域研究」，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四、研究方法的轉變：由傳統的

^⑥ 四十三年十二月三十日，本院「院士談話會紀錄」。

^⑦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三十年史稿第三章第二節「個人研究計畫」。民國七十四年二月出版。

「歷史學就是史料學」的觀念，逐漸重視社會科學的方法。並超出了早期近代史研究的範疇。近年來史料編纂的工作，已不再是本所的中心工作了。上述純就演變的實況而論，並未作任何價值的判斷和評估。至於今後發展的途徑，亦願略獻芻蕘，茲將淺見分述如下：

一、近代史研究的時限，固不可永遠停留在十九世紀，亦不能長久停留於民國初期，沈雲龍先生提出應加強抗戰史的研究，我深表同感。本所近年已開始注意到抗戰史，本年八月，並將舉辦「抗戰建國史研討會」，但因抗戰時期的重要資料，尚不能充分利用，研究起來，不無困難，今後在蒐集資料方面，仍須積極從事。並加強抗戰勝利後四十年（一九四五——一九八五）歷史的研究，包括國共之衝突，政府在臺灣的建設，以及大陸的中共政權等。也就是說，將研究時限後移至最近時期，務求涵容中國近代史之全貌。

二、區域研究(Regional Study)為近代史研究的一個嶄新方向，本所的研究，已具有相當的成績。惟過去研究，偏重於沿江、沿海的省份，及重要的港口都市（如上海），今後似宜擴及於中國腹地（如山西、河南、安徽、江西各省）和西北、西南地區（如陝、甘、寧、新、雲、貴各省），以及重要的內陸都市（如西安、蘭州、昆明）。

三、羅先生提出編訂「中國近代史料叢書」的目的，乃是為了要撰寫「科學的近代史」。我們不能永遠停留在編纂史料和研究專題的階段，重視過程，反而把遠大的目標忘記了。今後本所努力的目標之一，即為要羣策羣力的完成一部資料豐富、脈絡明晰、見解卓越、方法謹嚴、態度客觀的中國近代史，這部通史之完成，雖非一蹴可幾，但因本所一部分同仁曾參加過「中華民國建國史」民初部分的撰寫，已略具經驗和基礎，倘使努力以赴，似不難在未來十年之內，完成這一樁艱鉅的工作。

四、資料的處理，似宜借助於科學的工具。因為近代史資料卷帙浩繁，閱讀費時，若能擇其要者，輸入電腦，從事研究必可事半功倍。史語所研究員毛漢光先生與資訊所合作，主持史料輸入電腦的計畫，已將史記平準書，前後漢書、晉書、魏書、隋書、新舊唐書、舊五代史等之食貨志，共約二十萬字，製成人名、地名、官名、書名、專有名詞（包括人口、賦稅、鹽鐵、墾地等）及每段之「眉題」等項，成功的輸入電腦。現繼續製作宋史食貨志部分。另史語所之明清檔案，亦已初步計畫將人名、地名、官名、眉題四項輸入電腦。本所庋藏之檔案、官書、公報等，數

量甚夥，似亦宜擇其重要者，輸入電腦，必可節省蒐集資料之時間，而有助於創發性的研究。

五、本所向以中國近代史的研究為主，但近代中國，與歐、美、日、韓以及東南亞各國的關係，俱甚密切，必須多下一番知彼知己的工夫。今後似亦可分出一部分的人力，逐漸從事對西洋近代史，日、韓近代史暨東南亞近代史的研究。以求「比較」與「會通」。

三十年如一轉瞬。個人的生命，是短暫的，經過三十年風雨的侵蝕，青絲都變成白髮。而學術的生命，則是薪火相傳，冰水青藍，繼長續增，它勇猛精進，永無止境。際此本所設所三十週年的盛會，回顧已走過的迂迴曲徑，瞻望前面正在展開的坦途，內心有極深的感觸，也有無限的快樂。我很贊成李國祁先生所說「精誠團結」的意思，大家互相切磋，和諧無間，當更能促進本所的發展。我謹衷心祝福近史所前途光明，近代史的研究，在未來的歲月中，有更多、更豐饒的收穫。並祝各位精神愉快，身體健康。

四、王樹槐先生

討論中國近代史研究的過去與未來，其重點是以探討此一研究趨勢為主。中國近代史過去研究的趨勢，與整個中國歷史研究趨勢及世界歷史研究趨勢相同，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

- (一)以宗教、政治為主要的研究。
- (二)加入思想、學術、文化方面的研究。
- (三)再加入社會、經濟方面的研究。

此一歷史研究趨勢，是隨着人類知識發展而來的，而擴大其研究範圍，其轉變最大者為近百年之事。

中國近代史的研究，早期亦以政治、外交為主，後則擴及思想、學術、文化各方面，近則加強社會、經濟方面之研究。茲以香港大學所編之「現代論文集——文史哲論文索引」（香港，一九七九）所收集的八五五種論文集，計論文一萬餘篇為例，其中有關中國近代史者，列表如下：

| 類 | 別 | 篇 數 | 百 分 比 | 位 次 |
|---|---|-------|-------|-----|
| 文 | 化 | 97 | 5.6 | |
| 宗 | 教 | 91 | 5.3 | |
| 哲 | 學 | 114 | 6.6 | ⑤ |
| 學 | 術 | 98 | 5.7 | |
| 近 | 代 | 373 | 21.7 | ① |
| 各 | 省 | 291 | 16.9 | ④ |
| 中 | 外 | 309 | 17.9 | ② |
| 軍 | 事 | 31 | 1.8 | |
| 社 | 會 | 289 | 16.8 | ③ |
| 科 | 技 | 13 | 0.8 | |
| 藝 | 術 | 15 | 0.9 | |
| 合 | 計 | 1,721 | 100.0 | |

由上表看來，各社會學科專門史已居第三位，僅次於中國近代史及中外關係。居第四位者為各省史地，顯示地方史或區域研究亦為史家所注重之重點，雖然其由來已久，但近年來尤為史家所注意，亦為發展趨勢之一。

茲將各社會學科專門史加以分析，列表如下：

| 類 | 別 | 篇 數 | 百 分 比 |
|---|---|-----|-------|
| 政 | 治 | 71 | 24.6 |
| 法 | 制 | 15 | 5.2 |
| 社 | 會 | 16 | 5.5 |
| 教 | 育 | 29 | 10.0 |
| 財 | 政 | 14 | 4.9 |
| 經 | 濟 | 144 | 49.8 |
| 合 | 計 | 289 | 100.0 |

由上表觀之，經濟史居第一位，幾佔半數，可知史家對經濟史之重視，亦說明近年來對中國近代史研究之趨勢。

美國方面對中國近代史之研究趨勢，亦大致如此，根據柯文(Paul A. Cohen)

最近出版之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 (N. Y. 1984) 一書^①，美國方面研究中國近代史，亦可分為三期：

(一)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初，多是一些傳教士搜集的資料及研究，描述中國為主，如 *Middle Kingdom* 等書。

(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對中國的研究大為增加，其觀點則以西方為中心，強調西方對中國的影響，將中國近代史看成中外關係史。

(三)六十年代後，美國學者則注意到中國內部問題和發展，以中國為中心的研究，因而多注意到社會、經濟、文化各方面。

此種趨勢之轉變，受到美國對中國近代史解釋的觀點所影響，柯文提出美國學者過去中國近代史解釋的理論約有三種：

(一)中國對西方的回應——以鄧嗣禹、John K. Fairbank 教授合編之 *China Response to the West* (1954) 為代表。此種理論，係借自 A. J. Tonybee 的學說，*Challenge and Response* 的說法，解釋文化之發展。

(二)傳統與現代，以現代化的理論來解釋中國近代史，對傳統與現代之關係，多所評論。此則以 Fairbank 等教授所合著之 *A History of East Asian Civilization*, 1965 為始。

(三)帝國主義對中國近代的影響，有認為影響大者，有認為影響小者；有認為有害的影響多於有利的影響，有認為有利的影響多於有害的影響。大致而言，認為有害者多。此則受美國反越戰的影響所致。其中 Frances Moulder 女士提出 *World Economy Approach* 法來研究中國近代史。此種理論即與依賴理論 (*Theory of Dependency*) 大致相同，她用以解釋中日近代化所以不同的原因。

柯文認為這些解釋都有其缺點。目前美國方面研究中國近代史的態度，是採取以中國為中心的觀點，*China-Centered View* 來研究中國近代史，研究法有四方面：

(一)以中國的角度來研究中國近代史，重點放在中國內部問題，多過於西方對中國的影響，（但並非不注意西方的影響。）

(二)將中國分成不同地區來研究，即目前流行的區域研究。

^① 柯文教授新書出版後，承贈給本人一本，唯因事忙，尚未及全閱。香港中文大學梁家麟、王爾敏兩教授，對此書已有書評，介紹該書之內容，並加評語，見「漢學研究」，卷二期二（民國七十三年十二月），頁六七——六九二。另有 Lloyd E. Eastman 評論文，見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90, no. 1, (Feb. 1985).

(三)將中國分成不同的階層來研究，注意到下層社會方面的研究。

(四)採納不同學科的理論、方法及技術來研究中國近代史。

美國方面的研究與本所的研究趨勢，大致相同，而本所研究趨勢，又多多少少受到材料方面的影響，如早期外交檔案的利用，是一明顯的例子。現在我們又有了經濟檔，政府方面的檔案亦多已開放，可以利用，今後對經濟史方面的研究，自然會因為材料的方便而加強，未來此一趨勢的增強，甚為明顯。即使未利用經濟檔時，經濟社會史的研究已經加強，本所三十年史稿已明白指出。

近代史（包括現代史）的研究有三項特色：

(一)史料多：各種原始檔案多能保存其完整，且報紙、雜誌之多，與日俱增，對一般社會、經濟情況報導詳盡，可加利用。

(二)範圍廣：中國近代史的問題，不僅涉及社會各方面、各階層，而且涉及整個世界。

(三)多方面的解釋：史家本來有通才之稱，對歷史研究希望從各方面去了解，而目前又是知識爆炸的時代，同時研究技術方面，又因為科技之發達而進步神速。我們固然可以就各人知識專精之處，分題研究，但身為歷史家，亦須撰寫綜合性的通史，為一般人閱讀，也為整個歷史有一通盤性的解釋。所以研究中國近代史，所面臨的挑戰，比以往愈來愈大。

為了適應近代史研究的特色與未來的發展，今後年輕的學者，應加強本身的能力，以迎接此一挑戰。除了語文能力之外，應加強下列兩方面之能力：

①學習新的技術。量化並非研究歷史的唯一方法，但它能以簡御繁，對大量史料的處理，尤其具有數量的史料的處理，必須應用此法。故學者宜加強數理方面的訓練，數學應學到微積分，理論統計學也應涉獵，電腦程式也要學習，以便應付日益增多的社會、經濟方面的史料及簡化研究的成果。電腦的運用，已普遍深入各行各業，歷史研究方面亦早已開始，不僅增加研究的速度，而且增加其正確性。

經濟學可以說日進千里，已經到了以運用數理為主的研究階段，即計量經濟學。在數理應用方面，初則以數字作例證說明而已，算術已足應用，進一步則以數學符號簡化理論的說明，建立模型，如函數關係，聯立方程式等運用已足。目前則以數學、統計學的邏輯體系為推理工具，提供估測、檢驗方面的技術，社會科學亦已步其後塵，走向數理研究的方向。而歷史研究，尚停留在數字例證的階段，極待努力追趕，否則數十年之後，連今日所留下之社會、經濟方面的史料也看不懂。

②增加新知識、新觀念。今日是知識爆炸的時代，各類知識日新月異，社會科學的理論與新觀念也推陳出新，身為近代史家，對各社會科學之新觀念，應有一概括性的了解，一則對近代史料專門性的名詞有所認識，同時在處理各方面問題時，也能應用新觀念，以把握問題的重點。茲舉一例為證。以往研究各人職業發展及成就時，只注意到各人的家庭背景、教育程度、人際關係、個人才華及其努力的程度，這些因素固然可以說大多數人的職業成功的原因，但對於一些條件相等的人，而其職業成就卻相去甚遠的人則無法解釋。近來職業研究採取 path analysis 方法，提出一項新觀念，即第一次的職業 (the first job) 影響各人職業成就很大。此一新觀念，研究歷史人物時，亦應加以注意。

以上兩點，說明史學家應付未來近代史研究發展方面應有的努力，這種發展，只是時間的早晚而已，但早作此因應，則對近代史研究自可早日進入佳境。